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听文物讲故事⑮】

穿带瓶:在交流交融中催生的瓷艺珍品

□本报记者 院秀琴

草原、荒漠,高寒干冷之地,这里是辽阔的疆域。

相较于大宋的气候宜人、沃野千里,这里并不是生产生活的最佳选项,然而这里却和大宋一样,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瓷在我国陶瓷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继承了大唐的传统技术,吸收了五代和北宋中原地区新的工艺,又进行了创新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特点,反映了契丹民族勇猛、刚烈、剽悍的气质。不仅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的见证,更是我国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缩影。

穿带瓶就是辽瓷的代表性器物之一。珍藏在内蒙古博物院大辽契丹展厅的白瓷盘口穿带瓶更是我国陶瓷史上的珍品。



—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白瓷盘口穿带瓶

—图片来源于网络

多元文化的互动融合

辽代文化早期受大唐风情影响,瓷器有中原陶制产品的影子。

内蒙古博物院大辽契丹展厅策展人郑承燕介绍,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白瓷盘口穿带瓶胎白而细腻,釉色浓厚润泽,制作精细,圈足底部亦施釉。器物造型及烧制工艺具有唐代遗风,工艺水准并不低于辽代中晚期制瓷水平,是辽瓷之佳品,也是多元文化碰撞、交融与传承的产物。

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经济快速发展,文化高度繁荣,陶瓷制造业达到了顶峰,这对辽代陶制产品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宋辽百年睦邻、经贸、文化交流不断,又成为和平状态下契丹民族借鉴、学习中原陶瓷制作技艺的重要契机。

据相关文献记载,辽代契丹人墓葬出土的青白瓷器中,盏托、注壶、注碗、熏炉、粉盒等具有中原文化风格,用于饮茶、饮酒、焚香、贮粉的实用器具很多。

此外,在制瓷技艺方面,辽金瓷器在装烧技术和装饰技法上,均受到中原地区窑口的深刻影响。辽代大量流行定窑及仿定窑瓷器,以龙泉窑瓷为代表的北方诸窑口,不论在瓷器种类还是造型、装饰和烧造工艺上均体现出中原定窑的深刻影响。辽代契丹人墓葬出土的具有典型游牧风格的瓷器中,拉坯、贴塑、印花等主要成型方法以及装烧技术等,均是中原早已发展成熟的制瓷技艺。

凝聚在瓷瓶里的中国智慧

在内蒙古博物院大辽契丹展厅,白瓷盘口穿带瓶无疑是最吸引游客的文物之一。走近细看,它在明亮的展柜中熠熠生辉,光彩照人,我们仿佛能从它晶莹剔透的气质和挺秀丰满的身姿中,窥得那源远流长的文化和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自古以来,瓷器似乎总是以优雅的姿态吸引着人们的眼光,瓷器是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是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全世界耳熟能详的艺术语言,凝聚在瓷器里的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精神,让世界惊叹和着迷。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辽瓷的许多器物是在中原定烧的,契丹民族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素植入到中原文化当中,同时吸收了中原文化瓷器制造的高超技术,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的瓷器风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告诉记者。

辽瓷作为中国陶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文化的艺术化表现,也是中国智慧的结晶。

此刻,玲珑剔透的白瓷盘口穿带瓶中不再盛满清澈的山泉,却盛满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盛满了中华民族勤劳、质朴的禀赋与品质,盛满了中华民族追求精巧、追求极致的细心和耐心,盛满了中华民族聪颖、灵巧的智慧和理念。

我国陶瓷史上的珍品文物

白瓷盘口穿带瓶形制为喇叭形盘口、长颈、圆腹弧收,圈足略外撇,两侧肩部与腹底各有一组对称桥形穿系,穿系间有带槽,肩部饰三周凹弦纹,圈足内底亦施釉。口径12.8厘米、腹径23.3厘米、底径12.5厘米、高37.3厘米。这件穿带瓶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

该墓葬共出土穿带瓶3件,其中2件为白釉,1件为绿釉。另一件白瓷穿带瓶形制为折沿盘口、颈部上粗下细、腹部圆鼓、矮圈足。绿釉穿带瓶瓶口、颈残失,圆肩、鼓腹,下接矮喇叭状圈足。肩部两侧有对称的桥状穿系两组,穿系间为带槽,圈足上与穿带相应的部位有扁穿孔。肩、腹部均贴塑纹饰。肩部纹饰自上而下依次为垂鱼、联珠、垂鱼、弦纹、垂鱼;腹部纹饰为联珠纹带围绕及连接的扇形纹,扇形纹两侧及下部饰展翅昆虫。圈足底部的一周三角纹饰黄釉。

公元907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这是当时我国北方地区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耶律羽之是耶律阿保机的堂兄弟,曾跟随耶律阿保机平定当时的渤海国,设立附属国于大辽王朝的东丹国,后出任东丹国左相。

契丹人逐水草而居,在游牧过程中常需探寻水源,并取回驻地以供日用,自唐代沿袭而来的穿带瓶便备受契丹民族欢迎。

据相关文献记载,穿带瓶器形高大,辽境出土的穿带瓶高度大都在23—37厘米之间,是专门盛装液体的器皿,其腹部长圆容量大,盘口便于液体注入,而颈细使液体不易蒸发和流失。

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墓的石棺画上,再现了用盘口穿带瓶背水的场景,两位契丹人穿着短衣,脚穿黑毡靴,各背一个盘口、长颈、长腹瓶,一前一后行走在营盘所在的草原上。



—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图片来源于网络

■见证

千年古城的脉络



角楼遗迹。

□本报记者 阿荣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克里孟古城遗址,位于察右后旗韩勿拉山脉西缘中段,其南为灰腾梁山脉东北尾端,西为连绵起伏的丘陵,北是茫茫草原。这座阴山之北15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古城,是中国北方汉族与鲜卑等多个民族交流、交往、融合之地。

克里孟古城分东西两城,东窄西宽呈梯形,地势东高西低。城墙由沙土夯筑,残高约2米,有马面,设角楼。墙外土壤沟清晰可见。古城南北约500米、东西约1300米。古老的哈卜泉河自南向北穿城而过,断面上可见1.5米厚的文化层。东城建筑遗迹较多,地面散落着建筑构件和陶器残片等。东城中部,圆形土台犹存,土台依坡而筑,台面平整。土台又称“大土堆”,是中国古代建筑遗迹。它起源很早,从战国到秦汉时期,高台建筑甚多,这种建筑类型一直到明、清均有所见。高层建筑多在土台上建造,如宫殿和楼阁。这是一座具有特色的古城址,从采集和出土文物看,克里孟古城遗址为南北朝时期的城址。据《魏书·太祖纪》记载,北魏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在牛川复国。牛川即今察右后旗韩勿拉河流域一带,拓跋珪在此建“牛都”,即克里孟古城。察右后旗文物管理所所长马世宏说。

《后汉书》载:桓帝时檀石槐乃立庭于弹汗山,黠犍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里,兵马甚盛,东西皆归焉。东汉的高柳在今山西阳高县。据此推算,阳高北三百里,正好是今商都县、察右后旗一带。克里孟是蒙古语,为“城墙”之意。有专家认为,弹汗山即韩勿拉山,黠犍水即哈卜泉河。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荤粥、鬼方、猃狁等部族在今察右后旗一带游牧、狩猎。秦汉时期这里属雁门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是北魏拓跋珪所筑。辽朝这里属西京道。金朝改西京道为西京路都督总管府,这里属大同府宣宁县辖地。元朝这里西南归集宁路、北部归兴和路,直属中书省。清朝这里直属察哈尔都统。

克里孟古城地处北魏长城沿线,是长城沿线的一座边城重镇,是长城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克里孟古城遗址及周边二兰虎沟、三道湾、赵家房子、南二海古墓群等遗址,跨越的历史年代久远,历史序列完整。

克里孟古城遗址至今未进行考古发掘,只是多次进行田野调查。克里孟古城遗址的规模和保存的完整性,在阴山北部较为少见。克里孟古城是民族交流、交往、融合的历史见证,对研究民族融合、文化历史等具有重要价值。马世宏说。

(图片均由察右后旗文物管理所提供)



东城圆形土台遗址。



克里孟古城遗址全貌。